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6.010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方 群

(广州航海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 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 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 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 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 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关键词: 古代涉海小说; 叙事流变; 叙事结构; 叙事视角; 神话传说; 写实; 文学虚构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6-0064-07

引用格式: 方 群.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6): 64-70.

Narrative Evolution of the Sea-Related Novels in Ancient China

FANG Q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Maritime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Sea-related novel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many works from Six Dynasties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marine narrative ele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sea-related novel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with Pre-Qin Dynasty to Han Dynasty as the gestation period, the period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s the beginning period,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s the developing perio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the mature period.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novel sea writing, we can see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sea-related novels have experienced narrative evolution from imagination to credible knowledge, from myth to legend to documentary to conscious literary fiction.

Keywords: ancient sea-related novels; narrative evolution;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perspective; myths and legends; realism; literary fiction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自古以来濒海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海洋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濒

海地区的海洋地理环境和海洋生产生活方式, 形成了濒海地区独特的海洋文化, 这种海洋文化对

收稿日期: 2019-09-08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20世纪前中国小说与英美小说海洋意象比较研究”(2018GZGJ85)

作者简介: 方 群(1977—), 女, 湖南岳阳人, 广州航海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西海洋叙事。

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海经》为滥觞，中国历代出现了许多涉及海洋题材的叙事作品，譬如博物志小说中的海洋物产记载和章回小说中以海洋为背景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章回等。这些叙事作品不同于西方海洋小说，其只是题材上有“涉海性”^[1]，并不是《鲁滨逊漂流记》《舵手》和《白鲸》之类的海洋纪实性作品，因此，本文用“涉海小说”这一概念指称中国历代小说中的海洋叙事。鉴于中国小说文体发展的特征，本文考察的涉海小说文本范围涉及神话小说、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以及章回小说。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缘起及各时期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本文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以此呈现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一 先秦至两汉时期：海洋叙事孕育期

先秦至两汉时期中国航海技术不发达，先民们主要通过想象构建海外世界，涉海小说只是零散地见于《山海经》《列子》《庄子》等地理博物志中。《山海经》以山为经，以海为纬，记录着上古先民对海外世界的认知与想象，被学界视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起点，奠定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瑰奇浪漫、玄虚幻诞的艺术风格，在叙事空间和叙事题材上孕育出中国古代小说海洋叙事的基本要素，具有原型意义。

先秦时期的地理博物志小说中出现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空间的雏形：岛屿仙山与殊方异域。岛屿仙山表达对海外世界的向往与憧憬，殊方异域表达对海外世界的好奇与惊讶，这两种颇具神秘色彩的超现实叙事空间为后世涉海小说荒诞离奇的情节提供了逻辑理据。岛屿仙山叙事空间一般设置在茫茫大海中一美丽神秘的孤岛，岛上有仙山，主人公依靠神仙法力或者暴风雨力量得以进入岛上神仙世界，譬如历代涉海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蓬莱山。《山海经·海内北经》写“蓬莱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2]282}。在《列子·渤海五山》中，蓬莱山开始被渲染神秘色彩，“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返，不得暂峙焉”，并指明其具体位置在“渤海之东”^[3]。魏晋时期《海内十洲记》中蓬莱山位置由渤海变成东海：“蓬邱，蓬莱山是也。对东海之东北岸，

周回五千里，外别有海绕山。”蓬莱山“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来。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宫，盖太上真人所居。唯飞仙有能到其处耳”^[4]。宋代《搜神秘览》对蓬莱山进行具体描写，“至一断崖悬壁，峻立山之垠，云雾晦蔽。遥于昏霭中，有三峯鼎峙，依约楼台出耸。”^[5]清代《蓬莱三岛》指明“蓬莱三岛，尝疑为诞妄之词，未必确有是地”^[6]。巡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不难发现美丽神秘的蓬莱山已经成为岛屿仙山的符号，其是否真实存在已经不重要。

殊方异域叙事空间一般设置为光怪陆离的海外异族世界，是华夏“我族”对海外蛮夷“他族”的翩跹想象。《山海经》中记载了海内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居民，其对殊方异域远国异民的想象多以生理构造特异性为标志，譬如长臂国人臂长两丈，聂耳国人耳大垂肩，厌火国人兽身黑色口能吐火，羽民国人面鸟喙赤目而白首等。把远国异民想象成为人与动物结合的怪异生物，可能是源于远国异民的图腾、面具或纹身在口耳相传过程中，变异为神奇怪异的东西。

先秦时期的地理博物志小说中没有复杂的叙事情节，却孕育着丰富的后代涉海小说叙事题材，譬如海洋大物、海上人鱼和海神等。《山海经》中有磅礴的海洋大物描写，巨兽“夔”“其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2]297}。《庄子·逍遥游》状写神兽鲲鹏：“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7]自此伊始，后世涉海小说中频繁出现“大蟹”“大鱼”和“大虾”之类的海洋大物，并被描写得极致夸张。《山海经》中出现了海上人鱼的原型：“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2]281}，“有鱼偏枯，名为鱼妇”^{[2]326}。《山海经》塑造了“人面鸟身”“践两赤蛇”的东海、西海、南海和北海四海海神形象，《庄子·秋水》中有河伯与北海海神“若”的对话，这些形态怪异的海神在后世涉海小说中衍生成为龙王、龙母、龙子和龙女等系列海神形象以及民间观世音和妈祖等海神信仰。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洋叙事发轫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航海技术得到发展，出现

了朝贡、商业、宗教、征讨等活动,先民们主要通过海外奇物异事的记载等传闻之辞构建对海外世界的认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涉海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开始完善,但仍以海洋物象描述地理博物类小说为主。同时,佛教带来异域海洋观念与故事,道教仙道观念与活动也在涉海小说中得到了反映。

魏晋时期涉海小说叙事结构已渐趋完整。晋代《博物志》“八月浮槎”的故事讲述有居海渚者每年八月乘浮槎往来天河,故事交待了居海渚者往来天河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其中有具体的环境与人物描写:“去十余月,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有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8]这一则故事将民间关于天河、海洋和牛郎织女的传说融为一体,已经是一篇完全意义上的涉海小说,反映出古代先民对宇宙、海洋和人类关系的思考。

中土道教宣扬修道成仙,以求永生,这对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影响深远,其在小说中表现为岛屿仙山与神仙方术之说。涉海小说中的岛屿仙山叙事空间可以追溯到《山海经》。凡人总有生老病死,而神仙是永生的,《山海经》写海洋是日升月沉的地方,那里有神仙居住。海上寻仙故事自秦始皇遣徐福率童男童女前往东海寻求不死之药开始,在中国古代涉海小说中绵延不绝。魏晋时期《博物志》前三卷中的域外题材小说中有浓郁的神仙思想,长生不老和羽化登仙是其重要叙事主题,多宣扬神仙方术之说,表现为神仙托梦或者寄语,后得以灵验。魏晋时期《海内十洲记》讲述汉武帝听王母讲八方巨海之中有神洲,遂向东方朔询问。魏晋之前的海洋地理观主要有三种:“四海说”“大九州说”和《山海经》海洋地理观。《山海经》中“山——海内——海外——大荒”的海洋观念可以视为对“四海说”和“大九州说”的修正,以神话和想象描绘出虚幻荒诞的海外世界。而《海内十洲记》则融合先秦的蓬莱、方丈、瀛洲海中三神山说及西汉的“十洲三岛”说,建构出系统的道教海上神仙世界,传播海上仙山的信仰。

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土,宣扬因果相报,劝人为善,譬如“温媪故事”中的因果业报思想。“温媪故事”最早见于晋代《广州记》中:“有龙掘浦口,昔蒲母养龙。龙取鱼以给母,母断鱼,误斫龙尾,人谓之龙掘。”^[9]此书中并没有温母放龙情节。

南北朝时期《南越志》写温媪拾异卵,破壳后任其去留;唐朝《岭表录异》中温媪送龙子到江边,且点明不期待龙子报恩;宋朝《太平广记》记载温媪得到异鱼后,将鱼放回康州悦城江中。如果将这些不同版本的“温媪故事”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温媪故事”情节演变过程:温母有意豢养龙子——温母偶遇龙子,任其去留——温母放归龙子,龙子报恩。“温媪故事”的流传演变表达出岭南地区的龙母信仰以及佛教善恶有报思想。

三 唐宋元时期:海洋叙事发展期

唐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比较发达,东南沿海地区已形成较大规模的海洋商业文化。宋室南迁后,宋朝追求经济利益,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获取市舶收入。元朝时期,市舶与赋税、盐法、商税一样,成为“军国之所资”^[10]。与此相应,唐宋元时期涉海小说志怪色彩渐淡,现实色彩日浓,涉海小说由笔记体转向传奇体,小说篇幅加长,故事情节曲折,在叙事技巧、叙事题材和叙事语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文体。

唐代涉海小说叙事视角出现了全知视角和内视角。全知视角是小说叙述者视角大于小说人物视角,叙述者全知全能。譬如《叶限》篇中鱼的来历,鱼骨的最后归属都由叙事者讲述,这是此后涉海小说中应用最广泛的叙事视角。内视角是叙述者视角等于人物视角,叙述者从某个人物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叙述故事,叙述者进入故事和场景,或讲述亲历或转述见闻,其话语亲切可信。内视角包括主人公内视角和见证人内视角两种。内视角叙事在唐代涉海小说中运用较多,譬如《白幽求》篇即是从主人公白幽求视角叙述其过海遇风,漂至一岛,跟随水府使者来到水底宫殿,见水府真君,得知自己已任水府使。主人公内视角有利于揭示主人公深层心理。白幽求在面对成仙这一诱惑时,犹豫不决,不敢接受,错失良机之后,又悔恨不已。见证人内视角即是由次要人物叙述的视角,这有利于塑造主要人物的完整形象,必要时叙述者可以对所叙人物和事件作出评价。见证人叙述主要人物故事,由于其进入场景,可以与主要人物之间形成映衬、矛盾和对话关系,从而强化作品的真实性,扩展作品

的表现力。譬如《博导志·许汉阳》篇中，小说开篇是主人公内视角叙述许汉阳在洞庭湖中偶遇六七女子宴饮，受邀入席，饮酒吟诗，相聚甚欢。次日许汉阳回到江岸，发现四人溺水，其中三人溺亡。然后小说叙述转换成见证人内视角，由溺水幸存者讲述龙女求诗之事，揭露许汉阳昨夜所经之事的恐怖真相：许汉阳所遇女子即是海龙王之女，许汉阳所饮之酒乃是人血；原本以为是一段美好的奇遇，却竟是如此血腥。这种由主人公内视角向见证人内视角的切换大大增强了小说人物和主题的表现力度。

与先秦神话叙事和魏晋玄幻叙事相比，唐代涉海小说在虚构的涉海叙事中加入大量写实元素，进行玄幻书写。唐代涉海小说一般开篇即交待主人公籍贯、身份、活动时间、地点以及相关时代背景，营造一种真实的氛围。譬如《元柳二公》开篇即写：“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备窜于鸛、爱州。二公共结行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州而欲越海。”^{[11]360}唐代涉海小说中许多主人公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譬如《李卫公靖》篇讲述李靖受龙王夫人之托，骑上骏马飞到云霓降雨之事。历史上的李靖是隋末唐初名将，后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但是《李卫公靖》中的涉海故事却是完全虚构的。唐代涉海叙事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嵌入虚幻的涉海故事之中，形成一种虚实相生的美感，让虚构的故事增添几分真实的色彩。

在唐宋时期，占卜和托梦等灵异预言叙事开始广泛地运用于涉海小说中。梦境叙事从现实世界到虚幻梦境然后又回到现实世界，极大地拓展小说叙事空间。譬如《仇池笔记·广利王召》中叙述者酒醉，梦中见到南海神广利王、东华真人和南溟夫人，奉命作诗，后被鳖相公指出诗中“祝融”二字犯王讳^[12]。梦境叙事可以预叙故事情节发展，起到预设前因、埋下伏笔的作用，譬如《醒世恒言》第十四卷之《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篇中梦境叙事：范二郎因错杀周胜仙而坐牢，死去的周胜仙托梦于范二郎，告知已经求过五道将军判其无罪。在审判时，判官薛孔目初判范二郎杀人刺配，但是，夜间梦见五道将军责令其改判无罪释放。这种梦境、占卜灵异预言叙事是小说情节扭转的关键，使得故事叙述惊心动魄又充满喜剧色彩，将现实

世界的危机与灵异世界的温情相交织，营造出一种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唐代涉海小说叙事语言呈现诗化骈俪化的特征，作者往往同时也是诗人，喜欢将诗歌嵌入小说之中。杨慎认为：“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世，而其诗大有绝妙古今，一字千金。”^[13]唐代涉海小说中的诗歌呈现出明显的涉海性，多用来渲染海洋美景，抒发离愁别绪，构建蓬莱仙境。如《白幽求》描写海洋夜景的诗：“日落烟水黯，骊珠色岂昏。寒光射万里，霜缟遍千门。”^{[11]983}该诗描写明月从海上升起，海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烟雾，海水反射着月亮的寒光，宛若冰霜千里，极力渲染夜色中海洋的神秘美丽。诗歌语言华丽，想象奇特，海洋波澜壮阔，奇异多彩的美景如在眼前，洋溢着古人对海洋的惊叹与敬畏。唐代涉海小说中有许多构建蓬莱仙境的诗歌，如《封陟传》中上元夫人的诀别诗：“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心。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11]1767}诗中传递出浓浓的离愁别绪，表达出谪居海上的寂寞——蓬莱仙境不过是茫茫大海中的寂寞孤岛。

唐代涉海小说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批富有冒险精神、严守商业道德的海商群体，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秦汉时期，朝廷推行贱商令，商贾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魏晋时期，商贾开始作为主角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社会地位仍然很低，譬如刘义庆《幽明录·杨林》中写商人杨林在焦湖庙中梦见自己与士人之女成亲，醒来却发现原来是美梦一场，小说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商贾与士人社会地位悬殊。唐代商业空前繁荣，中外交流频繁，商贾特别是胡商第一次大规模地作为主角出现在涉海小说中。胡商与海洋联系密切，泛舟出海的经历使得其见多识广、商业眼光敏锐、富于冒险精神，如《宝珠》《南海大蟹》等作品中塑造的胡商形象。

唐宋元时期涉海小说叙事题材得到极大拓展，涉及海上遇仙、海岛获宝和海上历险三个题材。唐代涉海小说的海上遇仙题材表现为海上漂流故事与海上仙境想象结合，形成海上乌托邦小说。在这些海上乌托邦小说中，凡人因各种因缘际会偶遇神仙，有幸一窥神仙世界，甚至与仙女缔结姻缘，表现出凡人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其中隐含

着出世思想。《元柳二公》中,元彻和柳实二公在登舟越海时遇飓风,漂入大海,在海中孤岛上偶遇仙人玉虚尊师和南溟夫人,并在其帮助下返乡。《北梦琐言·张建章传》写张建章在往渤海途中遇风浪,幸得女仙帮助,小说借女仙之口说明是因其品行正直所以施救,具有道德训诫作用。

唐代涉海小说中描述了许多海洋珍宝,形成“海岛获宝”与“龙宫取宝”两个叙事主题。佛典中有许多关于海洋宝物的记载,譬如《佛说海八德经》中:“海怀众珍,黄金白银、琉璃水精、珊瑚龙玫、明月神珠,千奇万异,无求不得。”^[14]这些记载形成了民间“海洋即财富”的海洋观念。

“海岛获宝”主题讲述人们因机缘巧合,在海岛上获得宝物。《广异记·慈心仙人》写袁晃出海时被风吹至一岛上,岛上有精舍,琉璃为瓦,琳琅为墙,器物皆是黄金,不可胜数。“龙宫取宝”主题写人类通过某种方式得以进入龙宫,通过平等交换或者强行夺取两种方式获得宝物,反映出人类与海洋的互动。《梁四公记》中龙宫取宝就是平等互惠的交换:龙宫位于深百余尺的洞穴中,

“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及嗜燕,若使遣通,可得宝珠”,因此梁武帝遣使者备齐龙脑香、美玉、空青及烧燕前往龙宫,而“龙女知帝礼之,以大珠三,小珠七,杂珠一石以报帝”^{[11]160}。《广异记·宝珠》中的龙宫取宝却是用强行夺取的方式获得。胡人在用重金购得宝珠以后,为达到成仙的目标,施展巫术从龙宫中逼取宝珠:“大胡以银档煎醍醐,又以金瓶乘珠于醍醐中重煎”,“至三十余日,诸人散去,有二龙女,洁白端丽,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11]466}。胡人用威逼胁迫的手段取得由二龙女和宝珠合炼而成的膏,以达其成仙的目的。

唐代中国国力强盛,航海事业发展迅速,航海活动频繁,唐代涉海小说中出现了丰富的海上历险题材,形成“海上航行遇险”和“海盗袭击遇险”两个叙事主题。海上航行的风险或来自风浪,或来自海洋怪兽,譬如卢求《康仲威》中主人公海上航行遇暴风雨,舟破入水。来自海洋怪兽的航行风险是海中大物题材的延续,譬如《南海大蟹》中波斯人在寻得宝藏欲乘舟离开时,被化身大蛇的山神追捕,幸得巨蟹出现,夹死大蛇。此外,海上航行也会遭遇被海盗劫掠的危险。广阔无垠的大海上,有载满货物的商船往来,而官府监

管有限,罪恶勾当容易被海洋风浪隐藏,因此海洋成为强盗频繁出没的地方。譬如牛肃《纪闻·李邕》中讲述日本国史带领5000人和10船珍货抵达海州时,海州长官“邕见之,厚给所须,禁其出入。夜中,尽其所载而沉其船”,然后谎报“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在奉命送日本使回国时,“行数日,知其无备,夜尽杀之,遂归”^{[11]2942}。海州长官李邕滥用职权,抢货沉船,杀人沉尸,并将罪恶推给海上风浪。李邕虽然罪恶滔天,但并未得到应有的处罚,反映出唐朝吏治腐败。

四 明清时期:海洋叙事成熟期

明清时期,渔盐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港市崛起,海洋群体壮大,涉海小说呈现出新的特点,出现了自觉的文学虚构意识。明代是神魔小说繁盛时期,涉海小说数量并不多,但在叙事题材、叙事技巧与思想主旨上较前代有突破,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批判力度,推动了清代涉海小说创作高峰的到来。

明朝期间,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朝廷海禁政策时紧时松,郑和七下西洋,诸种政治经济因素导致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兴起,海上发迹和抗倭叙事成为涉海小说重要题材。譬如“三言两拍”中《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和《叠居奇程客得助》将眼光投向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书写其海上发迹故事,反映出明代“重农抑商”社会观念的改变。明朝海防危机严重,东南沿海倭寇活动猖獗,频频侵扰沿海百姓,出现了以抗倭叙事为题材的涉海小说,其将海商个体的海上发迹经历置于中华民族抗倭历史这一宏大叙事之中。譬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写底层民众杨八老涉海从商却被倭寇掳去,最后举家团圆的故事。小说中有沿海百姓希冀海上发迹的愿望书写:“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贍家之资。”也有倭寇扰民的社会现象描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恣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备御。”^[15]此类涉海小说兼写海上发迹与抗倭故事,揭露出沿海居民的困苦生活、倭寇的凶残肆虐以及官兵的腐败无能,其中纠结着民与寇、寇与兵、兵与民的复杂关系,具有多重思想意蕴,并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

与前朝相比，清朝是独特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在此终结，传统的束缚与现代的冲击铸就出清代文学尖锐而内敛的特质。清代涉海小说数量众多，根据创作情况，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清初期，即顺治、康熙和雍正年间，代表作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10篇涉海短篇文言小说；二是清中期，即乾隆、嘉庆和道光二十年，代表作是李汝珍长篇白话小说《镜花缘》；三是晚清时期，即1840至1911年，代表作是王韬《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中的13篇涉海短篇文言小说等^[16]。纵观清代涉海小说，其始终承担着批判现实的社会功能，志怪与寓意紧密结合，体现出现实批判与理想追求的统一。

从作品类型看，海洋—岛屿型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涉海小说最基本的类型。根据进入仙山/岛屿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两种：遇风暴漂至仙山/岛屿以及被神仙邀请体验异度空间。海洋—岛屿型涉海叙事在清初期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从对海外世界变形夸张的想象演变成积极主动地出海寻找财富，譬如《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中对海市的描述呈现出“海上仅有，世上全无”海洋财富观。“罗刹”在佛教中指食人肉的恶鬼，佛教《罗刹国》故事旨在劝诫世人勿贪财好色，蒲松龄改编了这个故事，借用其故事情节，赋予新的思想。《罗刹海市》主人公马骥父亲衰老罢贾而归，对马骥说：“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仍继父贾。”^[17]“饥不可煮，寒不可衣”说明普通民众抛弃了追求仕途、农本商末的传统思想，肯定海洋的价值，认可从商的意义，主动出海寻找财富。

传统的殊方异域传说记述海外异族风土人情，传播异域知识，具有明确族群区分的社会功能。清中期李汝珍通过自觉的文学虚构，在《镜花缘》中借殊方异民针砭时弊，发出社会批评与醒世之言，拓展了殊方异域传说讽刺世情、展示社会政治理想的功能。《镜花缘》共一百回，其中第七至五十回写唐敖出海，这是以唐朝徐敬业和骆宾王起兵反对武则天称帝之事而衍生的海外游历故事。唐敖随小舅子林洋游历了长臂国、两面国、女儿国、无肠国、黑齿国等30多个国家，见识各种奇人异事和奇风异俗。“小说家总是依照现实世界的样式规模和秩序规则来设置超现实空间，使得超现实空间成为现实空间的仿制、变形、象

征或影射。”^[18]在小说超现实的叙事空间中，作者借人物言行和情节设置间接表达其对世态人情的看法，展开对现实的鞭挞和对未来的探索。在第十二回“双宰辅畅谈俗弊 两书生敬服良箴”中，君子国宰辅对中华的婚嫁、丧葬、争讼、宴请、祭祀、卜算、妇女缠足和男子纳妾等各种风俗进行评说，揭露出国民性格中的种种弱点。在第三十三回“粉面郎缠足受困 长须女玩股垂情”中，用性别错位的方法讲述在以女为尊的女儿国中，林之洋以男儿之身体验女子穿耳缠足之苦和敷粉描朱之辱，借此揭露男权社会的冷酷无情和女性命运的可怜可悲。在第五十回《遇难成祥马能伏虎 逢凶化吉妇可降夫》中，强盗夫人对丈夫纳妾之事的愤怒与惩罚，展示出初步的女性解放意识，唤起社会各界对妇女命运和妇女问题的关注。《镜花缘》中描述的海外诸国虽然在形体与习俗上与中国不同，但其所描绘的每一个国度都是中土社会部分地域、部分人物、部分行为的写照，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异与折射，这是对传统殊方异域传说的传承与超越。

晚清光绪年间是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分界线，梁启超等有识之士掀起小说界革命，小说功能开始转变，出现了以革命和改良为目的的政治小说，报刊等新型小说载体和传播方式出现。报刊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小说传播媒介的变化促使了清末文人的身份转型，由传统的士向近代小说家转变。小说作者身份的转型带来小说创作目的的改变，小说创作与商业利益追逐紧密相连。王韬在同治十三年创办了《循环日报》，被称为中国第一报人，同治十四年，王韬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是变法运动的先行者。王韬在光绪年间创作的三本文言小说集《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中的13篇涉海短篇小说表现出前代涉海小说中罕见的对封建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向西方文明主动学习的开放心态。

王韬有游历欧洲和日本的亲身经历，其涉海小说呈现出积极主动出海的姿态，其中有海外风光和风俗民情的真实描绘，向国人展示西方世界的先进性。譬如《淞隐漫录·闵玉叔》篇：“偶阅谢清高《海录》，跃然起曰：‘海外必多奇境，愿一览其风景，以扩见闻。’自是遇里中人由海上

归者,必询其行程,详其风土。”^[19]晚清时期,西方国家在科技和军事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成就,远超中华,而国人却没有危机意识,依然沉浸于“天朝为万邦之首”的自大之中。在《淞隐漫录·序》中,王韬指出当时小说创作和民众心理误区,“西国无之,而中国必以为有,人心风俗,以此可知矣……不此之务,而反索之于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岂独好奇之过哉,其志亦荒矣!”^[20]在《因循岛》中,王韬借因循岛简乡的故事揭露出西方列强的真实面目。《因循岛》讲述猎户项某出海遭遇风浪而漂流至因循岛之简乡,简乡原本富庶,但来了一群狼怪,“始到时,尚现人形,衣冠亦皆威素,未数月,渐露本相,专爱食人脂膏……立朝者皆声气相通,若辈又每岁隐贿多金。”^[19]狼怪狡诈善变,蒙骗岛主,胡作非为,耀武扬威,而立朝者又与狼怪“声气相通”,岛上百姓苦不堪言。在《因循岛》中,狼怪实则影射西方列强,反映中国百姓蒙昧无知、国家军事落后、朝廷官员与西方势力勾结的现实。小说艺术再现了清朝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其中既有百姓对当权者的愤怒,也有对西方列强的仇恨,这是以王韬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思索。晚清涉海小说与前代涉海小说相比,在对海外世界的呈现上,少了玄幻色彩,多了对海外世界的真实呈现,这种呈现中隐含着作者的政治意图,其肩负着“匡世新民”的历史使命,发出了属于近代中国的声音。

以《山海经》为滥觞,中国历代出现了许多涉海题材的叙事作品,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先秦至两汉时期地理博物志奠定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玄虚幻诞的艺术风格,在叙事空间和叙事题材上孕育出海洋叙事基本元素;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海洋财富观以及道教海外岛屿仙山修道成仙观念与活动在地理博物类小说得到反映;唐宋元时期涉海小说由笔记体转向传奇体,叙事技巧和叙事题材渐趋丰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文体;明清时期涉海小说将个人经历置于民族历史宏大叙事之中,出现了自觉的文学虚构意识,具有多重思想意蕴。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

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参考文献:

- [1] 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与文化[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1.
- [2] 山海经[M].方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 [3] 列子[M].叶蓓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16.
- [4] 张华,东方朔,崔豹,等.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博物志(外七种)[M].王根林,黄益元,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6.
- [5]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三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13.
- [6] 青城子.亦复如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49.
- [7]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29.
- [8] 千宝.搜神记[M].曹光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0.
- [9] 骆伟,骆廷.岭南古代方志辑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99.
- [10] 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J].思想战线,2017(6):74.
- [11] 李时人,何满子.全唐五代小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 [12]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1编第1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231.
- [13] 杨慎.升庵诗话: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803.
- [14]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一[M].鸠摩罗什,译.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8:819.
- [15] 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54.
- [16] 庄黄倩.清代涉海小说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5:22.
- [17] 蒲松龄.聊斋志异[M].张友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54.
- [18] 黄霖,李桂奎,韩晓,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230.
- [19] 王韬.淞隐漫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13.
- [20]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600.

责任编辑:黄声波